

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

——以汉赋“博物”取向为中心的考察

徐公持

内容提要 “文学知识化”，是文学将知识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，文学成为展示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载体，这是文学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。辞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，历来对它的写法有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等概括，而其质实无不归结于“博物”，博物化即是知识化。两汉著名的辞赋作品，多数可以视为文学知识化的代表作。汉代文学的知识化，是西汉前、中期“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”时代精神的体现，也是汉代处于知识大整合、大发展时期，当时全社会崇尚“博物”观念的产物。汉代文学的知识化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体质，文学作品兼有了知识文章甚至学术文章的某些品格。这种体质特征，使得汉代文学拥有了别一种魅力；但过度追求知识化，也会给文学性造成损害。

关键词 汉代文学 知识化 博物 辞赋

文学本来就是人类创造的整体知识中的一部分，就这个意义上说，文学就是知识。不过本文所说“文学的知识化”，是文学将知识直接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，文学成为展示知识的载体。这是在文学史上很少见的一种特异现象。汉代文学突出显示了“知识化”的倾向，以致成为一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。本文以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——辞赋为中心，讨论文学的知识化现象及其形成原因。

汉代的“博物”观念及其发生渊源

在“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”^①时代精神熏染下，汉代在文化上形成了“博物”风尚。“博”是“大”在文化知识领域中的代名词，“博物”就是尽可能多地拥有知识，就是“义尚光大”的文化诠释和表征。“博物”作为一种文化知识观念，其源甚早。至少我们从孔子那里可以见到权威的说法。他很重视“博学”：“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”郑玄注曰：“‘弗畔’，不违道。”^②又孔子本人亦以博学闻于当世：“达巷党人曰：‘大哉孔子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’”郑玄注曰：“达巷者，党名也，五百家为党。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，不成一名而已。”^③可见在孔子心目中，“博学”是“君子”的品格，是“不违道”的必要前提，由此博学也成为儒家的重要文化传统，而“博物”只是博学的自然结果。

汉代“博学”、“博物”风气得到传承并发扬。为了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相匹配，汉代致力于建设“博物”文化。这首先是与汉代最重大的文化学术事件——“经学”的兴盛和繁荣，有着直

① 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：“夫京殿苑猎，述行序志，并体国经野，义尚光大。”

② 《论语·雍也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2479页。

③ 《论语·子罕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2489页。

接关联。从汉初开始,朝廷陆续设立诸经博士,其后在武帝独尊儒术大文化背景下,经学成为皇朝官方学术,更因朝廷取士政策中包括“明经”、“文学”等内容,儒学成为广大文士进入仕途必修功课。汉代儒者世代传授,门生众多,不少经师门下,生徒以千万计,经学遂以大倡。“经学”内容基本上就是所谓“六艺”(“六经”),准确地说,“六艺”不是六部著作(一说“乐”无书),而是六大类学问。“六经”内容庞杂,包罗万象,构成一综合型文化学术体系。例如《诗》,虽然可以指“三百篇”具体作品,但它也是指一种著作类别,是诗歌甚至是文学的大类代名词,被赋予广泛的文学功能。春秋时期,道家主张“常使民无知无欲”(《老子》卷上),而儒家则力主“学而时习之”,崇尚知识。汉代确立礼乐制度后,儒家“六艺”就成为官方经典和公共教材。而“六艺”内容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“博”,“六艺”合起来,就是政治制度、道德准则、文化知识的大集合。对此司马谈在《六家要指》中劈头就指出儒学特点是“博”:“儒家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……”他又进一步解释说:“夫儒者以六艺为法,六艺经传以千万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,故曰‘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。’”^①司马谈虽站在批评立场上,但他的概括相当确切。司马谈还说到《春秋》的风格是“约其文辞而指博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,其实六经皆有此种内容和功能上的“指博”特点,这是一种文化“溢出”效应。“六经”本身既然具有知识内涵广博的特征,儒学在汉代的兴盛,就必然导致博学风气的盛行。又因经学培育出了一大批“博学”儒者群体,就为文化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总体说,经学的发达助长了“博学”、“博物”风气,促进了广泛领域众多学术门类的成长。汉代将一批高级儒者称作“博士”,突出了他们的知识性特点。

在汉代广大士人心中,“博物”是一种崇高品格,“博物”者是社会精英。对此司马迁曾正面论述道:

二十五年,郑使子产于晋,问平公疾。平公曰:“卜而曰:实沉、台骀为祟,史官莫知,敢问。”对曰:“高辛氏有二子,长曰阍伯,季曰实沉……由是观之,则台骀,汾洮神也。然是,二者不害君身。山川之神,则水旱之菑,禱之;日月星辰之神,则雪霜风雨不时,禱之;若君疾,饮食、哀乐、女色所生也。”平公及叔向曰:“善!博物君子也。”厚为之礼于子产。^②

司马迁通过晋平公、叔向之口,以“博物君子”来赞誉郑国子产,而“博物”与“君子”品格相联结,沿袭了孔子的思路。审视子产本节谈话,则内容颇广泛,包括历史、传说、“山川”、“日月星辰”、“饮食”、“哀乐”等,还有关于“疾”的知识。这些知识,实际上已经涉及社会、人文、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,它们合起来,构成“博物”的完整内涵。

季札是又一位被司马迁誉为“博物君子”的人物。季札聘鲁请观周乐,发表一系列关于音乐、文学、历史、各地风俗的经典性评论,这是文论史上一件大事。司马迁遂认为“延陵季子之仁心,慕义无穷,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!又何其闳览,博物君子也”^③。司马迁两次对历史人物作出“博物君子”的评论,表明司马迁心目中“博物”是一种崇高境界,代表了他的正面文化取向。

班固继而亦曾言及“博物”人物。他在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中又开列出一个名单,这些人物除孔、孟、孙(荀子)之外,大部分是汉代人,有董仲舒、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等,说“此数公者,皆博物洽闻、通达古今,其言有补于世”。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,班固在批评嘲讽司马迁同时,也不得不肯定他具有良好“博物”优势:“以迁之博物洽闻,而不能以知自全,既陷极刑……”此外,班固在写到司马相如、桑弘羊时,也说他们“多识博物”、“博物通达”等。范曄《后汉书》中写及的“博物”人物更多,他们有谷永(“前世博物道术之士”)、夏贺良(同谷永)、伏无忌(“博物多识”)、曹褒(“博物识

① 《史记》卷一三〇《太史公自序》,中华书局1959年版,第10册,第3290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卷四二《郑世家》,第5册,第1772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三一《吴太伯世家》,第5册,第1475页。

古，为儒者宗”）、郑兴（“好古博物，见疑不惑”）、贾逵（“博物多识”）、胡广（“博物洽闻，探赜穷理，六经典奥，旧章宪式，无所不览”）、周兴（“蕴棧古今，博物多闻，三坟之篇，五典之策，无所不览”）、孟光（“博物识古，研究典籍，锐意三史，多识汉家旧典”）等。

班固和范曄所列举的“博物”者，基本上也都是代文化学术精英，与司马迁所说“博物君子”性质相近。对于“博物”人物的社会定位，莫过于《后汉书·崔骃传》中一节文字：“自尧、舜之帝，汤、武之王，皆赖明哲之佐，博物之臣，故皋陶陈谟，而唐、虞以兴；伊、箕作训，而殷、周用隆……”这里将“皋陶”、“伊、箕”等人，既说成“明哲之佐”，又誉为“博物之臣”，前句突出的是政治能力，后句强调的是学识，可知学识备受尊重。正因此，汉代文士们在“博物”信念上表现十分坚定，它不仅是一种学识修养，更是一种光耀史册的人生荣誉。

两汉四百年尽管博物之风盛行，却尚未出现以“博物”命名的著作。张华《博物志》撰成于汉亡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晋，不过此书的撰写理念，显然来自先秦两汉，“博物”一语无论出处还是含义都受到汉人影响，亦无问题。张华自谓“余视《山海经》及《禹贡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地志》，虽曰悉备，各有所不载者，作略说，出所不见……”（卷首），可知作者是要对上古以及汉代各种典籍，做拾遗补充。所以他沿用先秦、两汉人的概念，以“博物”者自任。观《博物志》中所写内容，极为庞杂，按照今本各卷内容分布，有“山”、“水”、“五方人民”、“物产”（以上卷一）、“外国”、“异人”、“异俗”、“异产”（以上卷二）、“异兽”、“异鸟”、“异虫”、“异鱼”、“异草木”（以上卷三）、“物性”、“物理”、“物”、“药物”、“药论”、“食忌”、“药术”、“戏术”（以上卷四）、“方士”、“服食”、“辨方士”（以上卷五）、“人名考”、“文籍考”、“地理考”、“典礼考”、“乐考”、“服饰考”、“器名考”、“物名考”（以上卷六）、“异闻”（以上卷七）、“史补”（以上卷八）、“杂说”（以上卷九、卷一〇）。如此杂乱面貌，固然有后世版本散佚淆乱因素，但不可否认它本来就内容丰富，体现着儒家博物本义。以近代学术系统分析审视，则其内容所涉及学科，大抵有自然地理、人文地理、产业地理、民族、民俗、动物、植物、物理、化学、医药、上古历史、神话、民间传说、养生术、长生术、礼制史、音乐史、服饰史、词源学、版本学、文字学等等，最后二卷“杂说”上下，甚至还包括育儿生理学之“胎教之法”。学科范围涉及社会、人文、自然等众多门类，简直是“全科著作”，这实际上也表现了先秦两汉以来所蕴育出的“博物”理念的广泛内涵。张华作为当时一政治家、文学家，他在著作中陈述人文社会知识，当属正常，毫不奇怪。多少出人意表的是，他在书中谈及大量自然科学知识，另外语言文字学也占有很重分量。这两大领域的知识，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。由此可证，“博物”不仅是社会人文知识，也包括自然科学知识，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和能力。

汉代尚“博”的原因，除了对接大帝国时代精神、传承儒学观念之外，还与当时文化学术发展的大背景相切合。上文已谈及儒学昌盛背景下各学科知识受到重视。事实上，汉代在知识和学术领域，进入一个大整合、大发展的时期。这种整合发展表现在各个领域。首先在与经学关系最密切的思想哲学领域，政治伦理及道德领域，社会制度规章仪典领域，历史文化领域，以及古籍整理和研究等等，都在整合先秦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，加进汉人的理解，形成新的学术文化体系。例如在思想哲学方面，整合了先秦道家、阴阳家的思想资源，建立起了完整的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思想体系。这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中表现最为明显^①。又在制度文化领域，整合了儒家、法家、道家的思想资源，建立起皇权天授、“三纲五常”等政治生活、人际关系的伦理规制体系。在历史文化领域，整合了先秦儒家、阴阳家等思想资源，建立起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发展观，对上古以来历史作出清理，为当代皇

^① 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阴阳义》：“天道之常，一阴一阳。阳者天之德也，阴者天之刑也。……天亦有喜怒之气，哀乐之心，与人相副。以类合之，天人一也。”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：“物莫不有凡号，号莫不有散名，如是事各顺于名，名各顺于天，天人之际，合而为一。”

权的合法性寻找神圣依据,编写出皇家史学著作等等。而在自然科学领域,在大帝国空前物质基础和皇权的支持下,通过对先秦时期各学科所取得成绩的整合,汉代更有综合性的发展,水平领先世界。

大帝国“义尚光大”精神的感召,对儒家“博学”传统的继承,经学昌盛的“溢出效应”,还有自然、社会、人文各知识领域和各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,这些都促成了汉代“博物”观念和风尚的形成及其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。缘此,“博物”遂成为体现汉代主流文化观念的重要表征。

汉代“博物”风尚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

同时代两种文化要素之间发生交流和彼此影响,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。汉代发生的情况,正是“博物”风尚对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,发生了重大的影响,它以颇为强势方式,浸润并介入了当时的文学写作,改变着当时的文学面貌。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讨论:博物风尚是如何影响汉代文学的?它有哪些具体表现?其后果和意义如何?

文学被某种特定文化观念和风尚改变,在文学史上并不稀见。不过发生这种事态,除了作为影响方的观念和风尚相当强势和流行,足以撼动和渗透其他文化品种的生态状况之外,那被影响方也必定存在某种好尚趋势,导致它无法抵御甚至积极迎合强势方的浸润和渗透。而汉代的文学正是如此,它本身在观念上存在明显的好尚倾向,使之在“博物”强势社会文化风尚面前,甘愿接纳其影响,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体质和面貌。汉代文学观念上的主要倾向性,一言以蔽之曰:功利性取向。从文学的性质到功能,都强调其实际功用,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方面的效用。关于对文学的实用功利性理解,可以追溯到孔子,他有经典名言: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^①这里除了“可以兴”、“可以怨”中含有一些表达情绪的文学固有功能外,其他说的多是社会政治道德性功能。而末句“多识……”是说学习知识的功能,应当算是第三重功能了,但也是实用性质的,而非文学的固有功能。孔子将“诗”的功能分解为三大类,其说本不能算错,但存在偏重实用功能的倾向。它使得文学的社会实用功能(即社会政治道德性功能加上知识性功能)负载太重,而对文学本性即第一重功能的发挥重视不够。时至汉代,独尊儒术,经学发达,经学掩盖了其他学问,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也被重新定位。当时的主导观念就是:“凡音者,生人心者也。情动于中故形于声,声成文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声音之道与政通矣!”^②“礼节民心,乐和民声,政以行之,刑以防之。礼、乐、刑、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矣!”^③对于文学艺术的性质,虽然能够理解为“生人心者也”,但对于其功能,则全都归结到“政”上去,结论是“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”;“乐”仅仅是与“礼”、“政”、“刑”联动的“四达”之一,目的在于推行“王道”。又说:“……故正得失、动天地、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、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、移风俗、正得失……”^④文学艺术固有的精神调节作用,感情抒发作用,生活娱乐作用,几乎全都被无视了,而“正得失”等等“教化”作用受到特别的重视。这些就是汉代经学家心目中的“诗”学。要之政治道德功利主义盛行,使得文学观念受到扭曲,严重地偏向社会实用,而忽略其固有的文学本性。可以说,汉儒放大了孔子学说的偏颇。所以后来曹丕索性认为文学的功能就是“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(《典论·论文》),完全是社会政治性质的。不过在汉代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中,虽然文学的个人性情功能基本被轻忽甚至抹杀,那作为文学第三重功能的知识性功能,却并未被忽视。孔子“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”的教导,还

① 《论语·阳货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525页。

②③ 《礼记·乐记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527页。

④ 《诗大序》,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70页。

被谨记着,我们看到不少汉儒解说“六经”的文字中,对于这些“名物”的“训诂”做得相当严谨认真,一丝不苟。汉儒“一经说至百余万言”(《汉书·儒林传》),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在做“多识”或“博学”的功夫。汉代“小学”著作《尔雅》中“释天”、“释地”、“释山”、“释水”之后,便有“释草”、“释木”、“释虫”、“释鱼”、“释鸟”、“释兽”等等,这里对各种知识门类的先后顺序,都大体按照孔子论“诗”的原话排列。皇侃根据汉儒的意思诠释“诗”的“多识”功能说:“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,是有‘鸟’也;《驺虞》、《狼跋》,是有‘兽’也;《采芣》、《葛覃》,是有‘草’也;《甘棠》、《械朴》,是有‘木’也。诗并载其名,学诗者则‘多识’之也。”(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九)可知汉儒的思路仍然谨守着孔子所阐述过的“多识于鸟兽草木”经典言论。

本来“博物”需要书面载体,这理应是科技或社会人文学术论著这些“纯”知识性文体的任务,它们是正宗“博物之文”。汉代产生的各门类著作不少,如《许商算术》、《杜忠算术》(数学),《律历数法》、《日月宿历》、《海中二十八宿国》、《图书秘记》、《灵宪》(天文历法),《水经》(地学),《宫宅地形》(建筑学),《神农教田相土耕种》、《种树臧果相蚕》、《董安国》(农学),《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》、《妇人婴儿方》、《仓公》(医学),《盐铁论》(经济学)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帝王诸侯世谱》(历史学),《李将军射法》、《杂家兵法》(军事学),等等。它们或者“特极阴阳之数”(陆绩《述玄》),或者记载天地社会各类物象事态,或者阐述事物性状及运转机制等等,无疑都是科技史或思想史上的要籍。扬雄的《太玄》,是汉代重要学术著作。其内容驳杂,既体现着玄学哲理思考,也凝聚了深厚知识。它被评为“深者入黄泉,高者出苍天;大者含元气,纤者入无伦”(《汉书·扬雄传》),堪称是博物巨擘。随着“博物”风尚的强势浸润,文学也接纳了博物内容。文学观念上的这种对“多识”功能的重视,实际上就是预先设置了一条对接渠道,让“博物”风尚进入文学领地畅通无阻。应当说,汉代文学各种文体,在创作上都受到博物观念的影响,但是,受“博物”影响最大的文体就是辞赋。

辞赋受“博物”影响,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早期楚辞中的屈原作品,占据最多篇幅的是情绪抒发部分,而非对于物类物态的描述。其中虽也有不少知识性内涵,如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之类,但真正写“物”的部分很少。所以在屈原作品中,博物成分并不浓厚。荀子“赋篇”开始写“物”,但一则篇幅有限,二则写法有类谜语,与后世辞赋实有距离。入汉,贾谊作品中“物”的成分增多,如《鹏鸟赋》以鸟为题,但叙述中心仍在人情,而非物态。可以说有“物”而未“博”。真正进入“博物”境界的便是西汉“枚、马、王、扬”诸辞赋大家。《七发》、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、《甘泉赋》等篇,以大量文字详细描述地理形胜、山川城池、飞禽走兽、土石草木等等,其“博物化”的面貌呈现无遗。其后,辞赋写作中的“博物”风气长盛不衰。

对于汉代辞赋的写作特征,古代文论家早有评鹭。有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等说法。前者出自王逸,其云:“……至刘向、王褒之徒,咸嘉其义,作赋骋辞,以赞其志。”(《九思·序》)这里将“作赋”与“骋辞”连写,明示“骋辞”即是“作赋”的基本特点。“骋辞”之“辞”,其含义不仅指语词、词汇,而是包括语词、辞藻的各种变化和技术性应用(即所谓“修辞”);“骋辞”则是展示丰富的辞采,以文辞或修辞取胜。后者出自西晋陆机:

诗缘情而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;碑披文以相质,诔缠绵而凄怆。铭博约而温润,箴顿挫而清壮。

颂优游以彬蔚,论精微而朗畅。奏平彻以闲雅,说炜晔而谲诌。虽区分之在兹,亦禁邪而制放。^①

陆机在这里“区分”当时各类重要文体的体式特点,以“赋体物”与“诗缘情”、“论精微”等对举,显然他认为“体物”就是赋的最重要写作特征。何为“体物”?李善注曰:“诗以言志,故曰缘情;赋以陈事,故曰体物。”(《文选》卷一李善注)李周翰注曰:“诗言志,故缘情;赋象事,故体物。”

① 《文赋》,萧统《昭明文选》,中华书局1977年版,第241页。

(《文选》六臣注卷一七)照二李的解释,“体物”与“陈事”相通,“物”可以包含“事”。故而陆机所谓“体物”,是指作品对于“物”(包括“事”)的一种体察和描述;通过这种“体物”,可以取得使描述对象更加“浏亮”的效果,亦即使得对象给人印象更加鲜明突出。应当说,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,基本上都符合辞赋体式的实际特征。它们说法不同,实质上意思相通,前者说在辞赋写作中要使用美丽繁缛的文辞,后者则说要尽量体察、体现描述“物”的丰富内容和面貌。前者主要说手段,后者主要说目的,要旨都可以归结到“博物”。后来刘勰又说:“赋者铺也,铺采摘文,体物写志也。”(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整合了两种说法,实际上也认可了辞赋写作中的“博物”特征。至此,辞赋的“博物”特征得到确认,无论是“骋辞”说或“体物”说,它们实际上准确反映了辞赋这种文体所具有的“博物”特性。辞赋的这种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写法特征,本来就具有“炫博”、“逞博”目的,所谓“极声貌以穷文”、“写物图貌,蔚似雕画”(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都可以通向“博物”;加上辞赋篇幅长,容量大,自然成为“博物”的一种良好载体。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等典籍著录中,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汉代辞赋作品,它们虽然保留着“赋”的名称,但似乎已经完全以博物为内容,如《杂鼓琴剑戏赋》十三篇,《杂山陵水泡气象雨旱赋》十六篇,《杂禽兽六畜昆虫赋》十八篇,《杂器械草木赋》三十三篇^①,等等。应当说,这些是极端的辞赋作品,它们在体质上已经全面博物化了。更多的汉代辞赋作品,则并未发生基本体质的变化,而是在辞赋的原有体制中,或多或少掺入了博物的内容。

汉赋遂循着博物的取向,规制着自身的写作方式。四百年汉代辞赋的写作历程,深深地打上了“博物”的印记。

语言文字学:汉代文学的“博物”印记之一

汉代文学特别是辞赋作品中的“博物”印记相当明显。从内容上看,“博物”当然是全方位的,涉及领域很广泛。如哲理知识,人文社会学科知识,自然科学知识,还有当时最为盛行的经学知识,等等,皆可入赋而为“博物”之内涵。不过最突出的当属两大知识领域:语言文字学领域,科学技术领域。原因有二:首先是这两个领域的学科知识性最强,尤其是与“六经”本身相比,它们是属于“新鲜的”知识;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汉代的发展非常强劲,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。它们代表了当代“博物”的新成就,引起“博物”者的更大兴趣。

在汉代的“博物”风尚中,语言文字学为何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?这问题需要从秦代说起。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皇权帝国之后,虽然说“秦世不文”(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但为了与大一统政治相匹配,消除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潜在文化影响,在整顿语言文字方面曾经下过大力气,具体表现就是推行“书同文”政策。由此,本来只是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学,当时被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,成为巩固发展大一统皇朝体系的重要政策部分。汉皇朝建立起了更加稳固的大一统政权,所以在语言文字的清理整顿和规范化方面赓续其事,继续推进语言文字的全国统一事业。此事又由于独尊儒术而得到加强,因为儒术的根本在经学,经学的基础部分是“小学”,而“小学”的基干就是语言文字学。为强化儒学影响,必须对儒学经典作出权威性诠释,尤其是那些上古典籍,舍语言文字学别无他途。借助于经学的发达,汉代语言文字学成为官方学术,自身也得到长足发展。所以秦汉语言文字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当时产生的语言文字学著作,有秦丞相李斯作《苍颉》七章,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》六章,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》七章。入汉,有司马相如作《凡将》一篇,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》一篇,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》一篇,扬雄作《方言》、《训纂》一篇、《苍颉传》一篇、

^① 此处所引述诸辞赋作品,皆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诸篇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皆不见著录,可知原文早已遗佚,然而据其赋题,可以大致推知其基本内容。

《苍颉训纂》一篇，班固作《续苍颉训纂》，杜林作《苍颉训纂》一篇，《苍颉故》一篇等，此外作为经学重要工具书的《尔雅》，成书于西汉时期。这些都是语言文字学领域的重要著作。东汉刘熙的《释名》，在语义学上取得突出成就；而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一书的产生，在语源学、语义学和文字学方面，都是总结性的成果，标志着汉代语言文字学已经达到很高水准。语言文字学的发展，使得语言更加丰富、规范、精密、生动，文字表达能力也得到很大增强。汉代的文士们，手中既然掌握了一套全新的功能强大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工具，他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充分运用此工具，在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方面，在创造各种文化产品方面，去发挥自身才能的愿望。这是所谓“工具的冲动”，对于当时文化创造和知识学术的发达，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
关于语言文字与“博物”的关联，自上举秦太史令胡毋敬所撰书名《博学》可知，语言文字本身就是“博物”的一个领域。不过从根本上说，语言文字应当是知识的起点，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灵长动物中脱颖而出，建立自己的知识系统，作为认知工具的语言文字是必备的前提条件，它的重要性与一般人文学科不能同日而语。魏张揖说《尔雅》内容谓：“若其包罗天地，纲纪人事，权揆制度，发百家之训诂，未能悉备也。”（张揖《上广雅表》）晋郭璞评论扬雄《方言》一书功效，谓“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，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”（《方言注·序》），又说“俾后之瞻涉者，可以广寤多闻尔”。他们所谓“纲纪”、“瞻涉”，所谓“包罗天地”、“广寤多闻”，都是说语言文字的巨大认知功能，是其他任何学科不能取代的。在汉代经学昌盛时期，语言文字学往往表现为“训诂”的应用，对此宋代朱质说：

汉儒训诂之学惟谨，而扬子云尤为洽闻。盖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；博学详说，将以反约。凡其辨名物、析度数，研精覃思，毫厘必计，下而五方之音、殊俗之语，莫不推寻其故而旁通其义……（《跋李刻方言》）

将“汉儒训诂之学”推崇为“君子”“博学”的代表。又汉末许冲在推介其父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一书时说：

（许）慎博问通人，考之于（贾）逵，作《说文解字》。六艺群书之诂，皆训其意；而天地、鬼神、山川、草木、鸟兽、昆虫、杂物、奇怪、王制、礼仪、世间人事，莫不毕载。（《上〈说文解字〉表》，《说文解字》卷一五下）

所说该书内容，“天地、山川……莫不毕载”等等，既指文字，亦言事物本身，要之《说文解字》不仅是文字著作，也是内容饶富功能强大的“博物”之书。汉代语文工具著作发达，它们的出现，标志着语言文字领域知识化风气的高涨，也为“博物”活动和写作的展开提供了实际帮助。

关于语言文字学与文学的关联，需要指出的是，文学就是语言艺术，这两种学问本来就是亲密近邻。在汉代文学家中，有不少精通语言文字学，当时儒者心目中，儒学或称“文学”；而儒学中的重要部分就是“小学”，刘歆《七略》“诗赋”自成一“略”，而“六艺略”中含“小学”。两种学问的沟通和结合，是自然趋向。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一流文学家，都兼通语言文字学。扬雄为撰作《方言》，“二十七岁”之间“以问其异语”^①，用功极深；然而他又自述“心好沉博绝丽之文”（《答刘歆书》），他既博学，又好丽文，是一位兼综两个领域的人物。做语言学家，当文学家，都是他志尚的构成部分。看他在《方言》中，搜集了众多的同义文字，就可以知道他在语文领域的学问和功夫多么博大精深。“娥、嫫，好也。秦曰娥；宋、魏之间谓之嫫；秦、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。自关而东、河济之间谓之媼，或谓之姁；赵、魏、燕、代之间曰姝，或曰姁；自关而西、秦晋之故都曰妍；好其通语也。”（《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卷一）一个“好”字可以拥有许多同义字，而对它们的分辨又如此精细，难能可贵。既然拥有如此知识条件，他在辞赋写作中展现一二语文才华，也是自然而然之事了。

^① 《答刘歆书》：“雄常把三寸弱翰，赍油素四尺，以问其异语，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槧，二十七岁于今矣。”（参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八《扬雄集》）

刘熙谓：“文者，会集众彩以成锦绣，会集众字以成辞义，如文绣然也。”（《释名》卷四）“文”、“字”、“辞义”的关系，在这里被辨析得十分精细，显示了汉代文士在语言文字与文学关系问题上的自觉。“会集众彩”、“会集众字”，既是语文功夫，也是文学手段，何不同时展现，一举两得。所以我们看到汉代许多辞赋作品，炫耀丰富语汇与展示巨量文辞，成为它们的功力所在。

关于辞赋中展现语言文字知识和技巧的文例甚多，几乎大部分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此表现。刘勰“赋者，铺也”的概括，不是针对个别文例。屈原、荀子以下，宋玉在“骋辞”方面实开其端，其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等就是专门为展示某一类语词的丰富性而作。汉代辞赋的早期开拓者陆贾、贾谊等人，即已走上“骋辞”之途，如《旱云赋》、《鹏鸟赋》等。不过将“骋辞”写法推进到高潮状态的当属枚乘。《七发》是第一篇淋漓尽致地“会集众彩”、“会集众字”的辞赋代表作。所叙“音乐”、“美食”等七事，皆文字纷纭，绘声绘色，极言其“至悲”、“至美”、“至骏”、“至壮”、“怪异诡观”，其奇字怪语，僻文冷词，联翩而下，不一而足。“骋辞”达到最高境界者，还推司马相如，所撰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等，其中文字藻采的丰富性，那种“上下”、“左右”、“前后”、“内外”等全方位的多视角描写，又超越《七发》等篇。其后辞赋作者，不断步趋枚、马，甚至变本加厉，后来居上，尤其是以“体国经野”自任的一些“大赋”作者，如西汉王褒、扬雄、刘歆，东汉冯衍、杜笃、崔骃、班固、张衡、马融等，皆是遣字措词高手，他们作品的光采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和变化多端。以两汉时期撰写“七”体之作为例，傅毅《七激》、刘广世《七兴》、崔骃《七依》、李尤《七款》、张衡《七辩》、崔瑗《七苏》、马融《七厉》、崔琦《七蠲》、刘梁《七举》、桓麟《七说》、桓彬《七设》等等，如此众多作品，所撰体例无异，所设人物相近，作意更是雷同，无不模仿枚乘《七发》。这些公然仿制之物，它们以什么来证明自身的价值，能够立足于文苑而不被唾弃？无他，只有别出心裁的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和不断“出新”！汉赋中不同作者撰写同题作品是常见现象，如《甘泉赋》，王褒、刘向、扬雄诸人先后皆有所作，又如《扇赋》，班固、傅毅、张衡、蔡邕诸人先后亦皆有作，类似于“七”体和“扇”、“甘泉”之类辞赋，还有众多“京都”辞赋，这种主要以丰富变幻的语言文字来维持生命力的作品，在两汉时期正复不少。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风气，那就是“骋辞”风气。它们得到当时文坛的赞赏和推奖，被认为是文学才华的表现，于是我们看到竟然有众多作者，蜂拥投身其中，不避重复，竞相撰写这些“骋辞”之作，形成一股热门“潮流”，而“骋辞”手法作为辞赋文体的固有特征，也进一步得到作者们的认可。语言文字知识技巧与文学写作的奇妙结合，遂在这里得到充分实现。刘熙撰作《释名》，在语言文字领域中以“答难解惑”自任，他同时又自诩为“博物君子”（《释名·自序》）。可知在他的理解中，语言文字知识当然是“博物”所包含的内容；辞赋“骋辞”，遂成为汉代文学中的“博物”印记之一。

科学技术：汉代文学的“博物”印记之二

两汉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合发展期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萌发期在先秦，当时士人阶层人格独立，思想自由，创造活跃，思想文化学术领域，家派林立，百家争鸣，奇思妙想，层出不穷。秦汉大帝国建立，虽有“焚书坑儒”、“罢黜百家”事件发生，士人被权力所制约，思想受到一定限制，但对于科学技术领域，影响并不很大。相反，在强大经济物质基础及士人稳定生活环境中，加上主流文化形态的儒学本身也重视知识的学习和开发，鼓励实用性基础性的科技发展，所以此时科学技术有了进行大整合的可能。汉代科技的发展是全方位的，包括数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医学、应用技术等。详细介绍当时科技成就非本文主旨，这里仅举其大端，表明它们在当时文化领域拥有重大分量，并且对于“博物”风尚的盛行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。

中国古代最早的重要数学著作当推《九章算术》。书中汇聚九大类二百四十六个各种类型数学题，

逐一予以开解,其中涉及“方程”、“勾股”等问题,在人类数学史上第一次使用正负数的概念等等,创见甚多。三国时刘徽曾为之作注,谓“周公制礼而有九数,九数之流则《九章》是矣。往者暴秦焚书,经术散坏,自时厥后,汉北平侯张苍、大司农中丞耿寿昌,皆以善算命世。苍等因旧文之遗残,各称删补”(《九章算术注·序》),基本上可以确认,《九章算术》是汉代学者张苍等人的“整合”之本。对于本书的性质,刘徽说:“虽幽遐诡伏,靡所不入;博物君子,详而览焉!”它被归入“博物”之书,是“君子”所览,这是沿袭了孔子的思路。中国天文学起源很早,在天体构成问题上,最古老的有产生于商周时的“盖天说”,稍后有“浑天说”、“宣夜说”,汉代学者未尝提出新的说法,但在天象观测领域,却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创造。尤其是张衡,他制作了“水运浑象”仪器,以演示天体运动轨迹,标示日月星辰和地球的相对关系,比较直观地解决了一些天文学难题,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。崔瑗曾赞誉张衡“数术穷天地,制作侔造化”(《张平子碑》),即谓其天文学领域的科技成就臻于神妙之境。与天文学相联系的历法学,在汉代也进入新的阶段。上古历法多变,有“黄帝历”、“夏历”、“殷历”、“周历”、“鲁历”等。秦用“颛顼历”,汉初仍之不变,武帝太初元年(前104)朝野学者公孙卿、壶遂、司马迁、邓平、司马可、落下闳等经反复观测、计算、讨论,拟定新的历法,即“太初历”,它包括气朔、闰法、五星、交食周期等内容,在精确性和合理性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,延用二千余年至今不废。后来刘歆又著《三统历谱》,这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年历模式,包含了近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原理,其科学性得到后世学界广泛认可。汉代的气象学也有明显进展,董仲舒、王充等人都曾论及相关问题,《论衡》中就有关于云雨雷电等气象的解释,所说原理基本正确。地理学与人类生活极为密切,故而最早受到学者重视。与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拓展同步,朝廷对“天下”疆域的关注和了解,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展开,也都刺激着地理学的迅速发展。汉代对“舆地图”测绘和管理高度重视,《汉书·地理志》的编撰,具有总结性意义;而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三幅帛绘地图(地形图、驻军图、城邑图),都是准确精致的西汉文帝时期地图作品。中国自上古就生长出了独具体系的医学,汉代是传统医学发展公认的奠基时期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医学(分“医经”、“经方”两类)著作多种,确认为汉代的有十余种,可见其盛。中国第一部本草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,也成书于西汉时期,此后历代的医者无不奉之为不刊经典;淳于意、马长、冯信、杜信、唐安等,都是著名医者,“医圣”张仲景是东汉末人,他的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国第一部“理”、“法”、“方”、“药”兼备的临床辨证诊疗专著;“神医”华佗也是汉末人,他在外科领域创造了许多传世奇迹。此外,汉代在化学、冶金学、农艺学、建筑学、纺织学、造纸术等诸多领域,取得巨大成就,显著提升了中国的总体科技水平。

汉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,它与同时期的古希腊(后期)和罗马帝国(前期),形成东西两大文明中心,引领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发展。汉代科技的发达,是朝野众多“博物”者潜心钻研的成果,它代表着文士普遍知识素质的提升,也标志着当时文化总体结构的改进。这种提升和改进,还影响了文士们的立身行事方式和生活态度。例如两汉之间图讖之学在统治者中盛行,当时有一些不佞之徒为谋取私利赞成其事,怂恿刘秀“宣布图讖于天下”等等,而同时也有若干“博物”之士如桓谭、王充、尹敏等,甘冒风险,作出正面抗争,揭露这种神学迷信的虚妄本质。他们除了具有正直人格外,对基本科学知识的坚强信念也是重要的心理支撑力量。总之,科技知识在汉人心目中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,而且它也不仅是一部分“高端”知识者感兴趣之事,当时社会上其他人士甚至一般民众也有一定科技知识。连僻处禁苑中的皇家后宫仕女,也学习科技。史载和帝时“贵人”邓氏,就曾“从曹大家受经书,兼天文、算数”(《后汉书·邓皇后纪》),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,汉代就是“博物”的时代。

对于文学写作来说,科学技术与语言文字有着很大不同。首先科学对于文学来说,它不具有工具性,因此二者不存在“天然”的亲密关联。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,汉代的文士在儒学“六艺”的影响

下,大多拥有“天人合一”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,他们的“学问”也往往是综合型的,其中不乏“文理兼综”人才。那些被我们认识的“文学家”也好,“科学家”也好,其实大都很难判断其知识分野,他们知识面一般都很广阔,许多科技人物具有良好的儒学——文学修养,有些杰出科学家就是优秀的诗赋作家、文章高手。总之,他们都是一些“博学”者。如刘向、刘歆父子,他们都是天文历法专家,但也是重要文学家、史学家。张衡更是范例,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伟大贡献,在文学方面也是位杰出诗人、辞赋作者。浓厚的时代“博物”风尚,以及文士们自身的知识结构,还有“博学”、“多识”的文学观念,决定了科学与文学是要发生关联的,互相渗透、交互影响是必然取向。

汉赋在科技知识方面的“博物”印记,所涉作品甚多,形态和方式也总杂不一。以近代眼光衡量,其学科分布面很广泛,几乎当时所有科技知识,包括社会学科,都可以写进辞赋作品中来,用以“炫博”。从“博物”之赋的表现形态言,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。一类作品所写主题比较专注,涉及知识有一定限制,可以说是一些专题的“博物”作品,如数量众多的“咏物”(包括咏“事”)之赋即是。今存最早的一批汉赋如陆贾《孟春赋》、贾谊《虞赋》等皆是。此类作品一般围绕主题,专注于描述某个对象,层层发掘,“写物图貌”,务求真切。不过此类作品因其题材专狭,故而篇幅相对短小,只能算作“咏物小赋”,其“博物”的特性,主要在于深入细致,以某一事物为主题,描述穷尽作者之所知。另一类作品则内容弘富、篇制巨大,往往寓含某一大领域或者是多学科的知识,显示出综合性“博物”特性和品格。例如那些“京殿苑猎”之赋,往往跨越多种知识领域,它们既是文学巨制,也是知识府库。作品重点描写何种知识,则与作品题目特别是作者个人知识涵养有极大关系,并无定制。至于作者作品之例,这里只能略以时代先后为序,举其荦荦大者,以示其“博物”端倪。

首先是枚乘《七发》。本篇开首即曰“楚太子有疾”,然后写“吴客往问之”。吴客探视太子之后,开出治疗方案:“今太子之病,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;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。”全篇主旨,即在治楚太子之疾。所以本篇所写以治病为主。篇中对太子疾病的具体诊断是:“久耽安乐,日夜无极,邪气袭逆,中若结轳……”“纵耳目之欲,恣支体之安者,伤血脉之和。且夫出舆入辇,命曰蹶痿之机,洞房清宫,命曰寒热之媒;皓齿蛾眉,命曰伐性之斧;甘脆肥脓,命曰腐肠之药。今太子肤色靡曼,四支委随,筋骨挺解,血脉淫濯,手足惰窳……虽令扁鹊治内、巫咸治外,尚何及哉!”这些描写,传达出传统医学领域的知识系统;所说“阴阳”、“邪正”、“血脉”、“寒热”等,正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本支点,这是本篇“博物”的第一个领域。第二个领域则跳出医学,叙说各种社会游乐项目。针对太子症状,“吴客”放弃“药石针刺灸疗”等手段,转而提出以“要言妙道”为治疗之方。而能够以“要言妙道”进说者,必须由“博见强识”的“君子”来担任,这就正面规定了本篇的“博物”性格向更广泛的领域展开。以下“吴客”便说以音乐、美食、骑马、游览、校猎、观涛、方术等七事。此七事皆为发挥“博见强识”而设立,且都有详尽丰富的细节,其中也蕴含了不少科技领域知识,构成本篇“博物”内涵的重要特征。总体说,《七发》从医学入手,展开多领域的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描写,与此前的屈原《离骚》、贾谊《鹏鸟赋》等比较,表现了更多的知识性成分和“科技含量”。枚乘初步体现了辞赋博物化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关联性。

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的写作在《七发》之后,而其“博物”色彩也更加浓重。与篇幅的扩展相对应,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的比物属事更加丰富,而物类物态描述,也愈加精细繁多,体现了追求知识方面务求广博的品格。具体知识领域,则涉及地理地貌、山川分布、气候气象、城郭规划、历代建筑、动物植物物种,还有国家仪典、朝廷制度等等,知识容量很大。而每一类知识,也往往罄其所知,大量展示,山堆海积,络绎不绝;加上藻采绚丽,令人目不暇接。如“子虚先生”说“云梦之事”,“子虚先生”所说云梦泽中“众物”,“乌有先生”所说齐国“渤澥”之中“俶傥瑰玮,异方殊类;珍怪鸟兽,万端鳞萃”,“亡是公”所说上林苑之“亭皋千里”、“万物众夥”等等,种类繁多,名称冷僻,无论是草木或者鸟兽,多是珍稀奇特物品,普通读者大多需要参阅注解,才能领会。

这标志着作者将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功夫发展到极致。而论其实质,就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诸多门类知识,海量地向读者推出,体现着知识在量方面的扩张。此是其一。其二,作品在描述和叙述对象时,往往作多维度的视角转换,如《子虚赋》中一口气说“其山……”、“其土……”、“其石……”、“其东……”、“其南……”、“其高……”、“其卑……”、“其西……”、“其北……”、“其上……”、“其下……”、“其中……”等。这种多角度叠加式的描述,固然体现着向更广大、更细密的知识领域展开,同时更意味着在认知方法上的进步,即自觉运用多层次的、立体的、综合的方法,来弥补平面的、单向度的认知方法的不足,从而在知识的体系性上有所加强。

扬雄也是一位辞赋“博物”大家。他的《甘泉赋》、《蜀都赋》等,基本写法沿袭司马相如,在“博物”方面亦自成一家。尤其是他的《太玄赋》,集中写宇宙哲理、天道观,颇为玄奥,实际上是本体论哲学专论,可谓另辟辞赋“博物”之蹊径。

但是自“博物”境界看,东汉作者的功力更加雄厚深湛。此以班固《两都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等为代表。班、张等人之赋,篇幅更加宏大,场面更加壮阔,所写物类则更加繁多,物态更加精细,辞采更加绚丽,“博物”更加丰富,而其中的自然和科技知识含量也更加浓厚。

班固《两都赋》中写西都长安“穷泰而极侈”,更甚于《上林赋》,写其宫馆,有“自未央而连桂宫,北弥明光而亘长乐;凌阊道而超西墉,掘建章而连外属”,“又有天禄、石渠,典籍之府”,“又有承明、金马,著作之庭”,“张千门而立万户……”;形容出猎,则“绕酆鄠、历上兰,六师发逐,百兽骇殚。震震爚爚,雷奔电激;草木涂地,山渊反复”,门类繁多,文字迭耀,气势磅礴。在描述城市建设及风光,亦即在展示城市地理学知识方面,其功力又驾于西汉赋家之上。至于《东都赋》中写洛邑“宫室光明,阙庭神丽;奢不可逾,俭不能侈”,重心转而描述制度文化,“临之以王制,考之以风雅”等等,在“王制”与“经术”中尽情发挥,在另一个前贤辞赋涉足不多的知识领域里长篇大论,展示才情,表现其“博物”功力。

稍后有黄香,他的《九宫赋》在博物领域亦颇别致,它既无“润色鸿业”意图,亦非个人忧思寄寓,只是专门阐述作者“象数之学”感悟,而其阐述过程则融入古代传说神灵故事,以及不少天文、地理知识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其博物叙述重心由地理形胜、四方物产,转向更加玄奥的宇宙天文。如:

伊黄灵之典度,存文昌之会官^①;翳华盖之蔽蕤,依上帝以隆崇。握璇玑^②而布政,总四七而持纲^③。和日月之光耀,均节度以运行;序列宿之灿烂,咸垂景以煌煌……

这些都是关于上古传说结合天象的描述,所使用的术语如“会官”、“璇玑”、“四七”等,都具有相当的科技知识专业性,非一般文学作品所适用。但本篇却将它们组织进了辞赋篇章中,置于核心部位。

无独有偶,张衡在上疏提出主张禁绝图讖、反对神学迷信时,也说到“九宫”等问题。《后汉书》本传载其事曰:“自中兴之后,儒者争学图纬,兼复附以妖言。衡以图纬虚妄,非圣人之法,(衡)乃上疏曰:‘臣闻圣人明审律历,以定吉凶,重之以卜筮,杂之以九宫。经天验道,本尽于此。或观星辰逆顺,寒燠所由;或察龟策之占,巫覡之言。《易乾凿度》曰:‘太乙取其数,以行九宫……’”在张

① 此所谓“会官”,既指黄帝等天神会合于文昌宫殿,亦言土、木二星会合之官度。徐光启曰:“土星一年约行十二度,十二年方行四宫二十六度到乙。木星加四年之行亦到乙,而土星此时又行四十八度至丙。木星追上会合,如前所云,俱在八宫〇二度有奇,此时太阳之行已满天周十九次,外又行十宫八度十分矣。内减土、木二星相会官度,余二宫五度二十八分,是土、木二星,各距岁轮极远之处也。”(《新法算书》卷四三“二星会合图”)

② “璇玑”,即北斗魁第四星。然此处既谓“握璇玑”云云,当指一种玉制测天仪器,即所谓“璇玑玉衡”,亦即“浑天仪”也。

③ “四七”,为《周易》中“少阳”之数。宋朱震《汉上易传·丛说》:“……若以四位合之,则少阳数七,四七二十八也。”又指“二十八宿”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《石氏簿经赞》一卷,《星经》二卷,《甘氏四七法》一卷。晁公武《读书志》著录《甘石星经》一卷,注曰:“汉甘公石申撰,以日月、五星、三垣、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,有占诀以候休咎。”

衡的思想里,“太乙取其数,以行九宫”等等,是“圣人”所为,是“经天验道”的学问,与“图讖”等的“虚妄”、“妖言”绝不相类。这也正是黄香《九宫赋》的写作立场。《九宫赋》在知识的丰富性方面不及班固《两都赋》,但在知识的专业性上却能凌驾其上,因此在辞赋博物化方面做到了别具一格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其“经天验道”主张,实质上是以认真考察客观对象来验证人类知识的正确性,这是一种具有实证性质的认识论,属于“朴素的”科学认识论。这里的“道”,已经不是先验的、预设的,而是必须经过人的检验,才能得以确立。在汉代能明确坚持这种科学认识论,诚然难能。而在辞赋作品中能够写出此种精神,更加可贵。

在这种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,张衡《二京赋》中写自然山川、城市街肆、宫馆苑囿、名物制度等,既颇丰饶、全面,而且奇丽。可以说,在“博物”之丰富性上,《二京赋》可与《两都赋》并立,班、张的水平在伯仲之间。但在博物的专业性方面,张衡辞赋则可与黄香比肩,而明显超越班固。《二京赋》描摹山川城郭、百姓生活,涉及不少专业科技知识。如写“土圭测景,不缩不盈”;此是古代季候测量学专门知识,郑玄注曰:“土、度也,缩、短也,盈、长也,谓圭长一尺五寸,夏至之日,竖八尺表,日中而度之,圭影正等天当中也。若影长于圭,则太近北;圭长于影,则太近南。近北多寒,近南多暑,近东多风,近西多雨。”(《文选》卷三李善注)赋又写“上飞闼而仰眺,正睹瑶光与玉绳”,此是星相知识,李善注曰:“《春秋运斗枢》曰:‘北斗七星第七曰瑶光。’《春秋元命苞》曰:‘玉衡北两星为玉绳。’”(《文选》卷三李善注)诸如此类的专业科技内容,张衡之外,他人难措其辞。张衡还在赋中展示了他独有的“博物”体系。他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,不但知识丰富,更可贵的是还拥有其他文士所少有的古代“科学性”知识系统。例如关于宇宙论,张衡持“浑天说”。关于此说法,蔡邕尝谓:“言天体者有三家:一曰《周髀》,二曰《宣夜》,三曰《浑天》。《宣夜》之学,绝无师法。《周髀》数术具存,考验天状,多所违失,故史官不用。惟《浑天》者近得其情,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,则其法也。立八尺圆体之度,而具天地之象,以正黄道,以察发敛,以行日月,以步五纬,精微深妙,万世不易之道也。”^①张衡作为“浑天说”的集大成者,在《二京赋》中自然流露出他的天文学系统专业知识。例如赋中有“规天矩地,授时顺乡”等语句,这就是“浑天说”的一种表达。李善注曰:“谓宫室之饰,圜者象天,方者则地也。”又写“清道案列,天行星陈”,这是描述星系运转轨迹及其状况。又写“摄提衡衡,徐至于射宫”,这是说北斗摄提有六星玉衡,北斗中星主回转,徐行至于射宫位置,等等。

张衡《二京赋》中的“博物”特色,更在于其知识系统的科学性。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篇中写到“上林禁苑”时他明确说:“植物斯生,动物斯止。”这是汉语中“动物”、“植物”作为名词的最早文例,而其含义竟与近代学科分类完全符合,所以它们不是一般随意用词,而是清晰明确的科学概念。赋中紧接着就分写“植物”与“动物”。植物部分有“林麓之饶,于何不有?木则……草则……”,动物部分有“鼃、鼃、巨鳖,鱣、鲤、鲟、鲂……鸟则……众形殊声,不可胜论”等等。在张衡之前,辞赋家们写及的物类品种已经很广很多,为叙述的便利,他们也做了一定的系统分类;所分类别,一般都以“草木鸟兽虫鱼”之类为纲领,无论枚乘、司马相如,还是王褒、班固,莫不如此;连当时的“工具书”如《尔雅》中也如此^②。但这种以直观为特点的知识分类法,早在孔子时代即已存在,时隔六七百年,汉代的“博物”家们仍然沿用这种直观式的知识系统分类准则,未免有些原始和鄙陋。《二京赋》写及物类品种,在数量上并无根本的超越;真正在博物史上具有超越意义的,就是张衡的

① 范曄《后汉书》志一〇《天文上》刘昭注引蔡邕《表志》,中华书局1965年版,第11册,第3217页。

② 《尔雅》全书,分别是“释诂”、“释言”、“释训”、“释亲”、“释宫”、“释器”、“释乐”、“释天”、“释地”、“释丘”、“释山”、“释水”、“释草”、“释木”、“释虫”、“释鱼”、“释鸟”、“释兽”、“释畜”,其知识面虽有扩大,而“天地山水”、“草木虫鱼”之类架构并无根本改变。

分类法。“动物”、“植物”的分类,看似简单,却大大强化了博物系统的科学性内涵,与“草木鸟兽”分类法相比,在叙述逻辑和知识理性上显然提升了一个档次,体现了从“古典式”知识系统向近代性的过渡。就“文学的知识化”这个课题而言,张衡的辞赋创作进入了一个独到的巅峰境界。

自然科学知识入赋,使汉赋呈现更加鲜明的“博物”印记,也是文学知识化更令人瞩目的要素。

汉赋“博物”化之魅力及问题

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,汉代文学尤其是辞赋的知识化色彩是最为鲜明的。汉赋的“博物”化,给它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。首先,它使得原本只是文学体式之一的辞赋,具备了其他文体少见的知识化特征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,由于辞赋具备了知识化特征,使得它扩展了文学的属性,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辞赋的体质。文学作品兼有了知识文章甚至学术文章的某些品格。一些优秀辞赋作品中“写志”与“体物”两种成分配置得当,做到了“睹物兴情,情以物兴”(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),实现了文学性与知识性兼容,文学性与知识性(甚至是学术性)的联姻,增强了作品的丰富内容和典雅风格,增强了所谓“书卷气”。而叙述逻辑和知识理性在作品中得以提升,又开辟了文学的新境界,造就出辞赋的新魅力。

但是文学与知识,严格意义上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,解决好二者的兼容关系,是个很微妙也很困难的课题。知识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当,便容易出现彼此妨碍、互不兼容甚至彼此排斥的弊病。特别是某些“专家”式辞赋作品,虽然在“博物”方面颇突出,作者也往往学识精湛、充满才气,写得十分精致整饬,甚至达到了“专业化”水准,但由于知识性过于强烈,内容过于专门高深,对作品的文学体质反而造成了抑制或消减作用。这样的作品,可以想见难以得到一般文学读者的充分理解和欢迎。它们虽然知识性增强了,但作为文学的感染力却减弱了,所以辞赋“博物”化,文学知识化,也很可能会出现负面影响。这是一把双刃剑。

东汉中叶以后,汉代辞赋在“博物”方面续有发展,有些作品在“骋辞”或“体物”上也显示出若干新的面貌,如马融《长笛赋》,将对象的各方面特征,包括长笛的材质、制作过程、外形象征、吹奏方法、音乐效果、礼乐意义等等,发掘得纤毫无隐,在“博物”功力上也达到很高造诣。还有蔡邕等人的作品,也都写得很细腻精致。不过在写作方法上的创新和开拓,却不再有大的进展。而辞赋写作中文学性与知识性的内在抵触关系问题,也愈发暴露出来。基本问题是,辞赋作为文学之一品种、一体式,它不能不受到文学固有特性的约束,文学艺术要求作品“可以导养神气,宣和情志”(嵇康《琴赋》),“睹物兴情,情以物兴”,侧重从人之情志出发,围绕情志展开写作。至于“物”,人生本身也可以算作广义之“物”,但无论如何,“物”与“情”是两种存在主体。文学不能重“物”轻“情”,甚至取“物”而舍“情”。陆机《文赋》将“情”与“物”分别系于两种文体“诗”与“赋”,这种表述方式将“情”与“物”割裂开来,似乎赋可以不要“缘情”而只需“体物”,是有缺陷的。作为文学之一“体”的辞赋,如果真的消解了“情”的重要地位,“去情化”的结果必然导致辞赋本身失去作为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功能,辞赋写作将误入歧途。误入歧途的最明显例子就是西晋左思的《三都赋》。此赋在名物搜集和实事实考上花费巨大精力,所谓“构思十年”(《晋书·文苑列传·左思》)等等,并非虚语。左思如此用功,为的是求博,“自以所见不博,求为秘书郎”(《晋书·文苑列传·左思》)。《三都赋》以“本其实”为写作宗旨,在赋序中讥嘲班固、张衡的作品“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,按之神物则出非其所。于辞则易为藻饰,于义则虚而无征”;同时自我标榜“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,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,风谣歌舞,各附其俗,魁梧长者,莫非其旧”。刘逵为之作“序”,说作品“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,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”(《晋书·文苑列传·左思》)。卫权为之作《略解》,称赞《三都赋》“言不苟华,必经典要;品物殊类,稟之图籍”,“其山川、土域、

草木、鸟兽、奇怪、珍异，金皆研精所由，纷散其义矣”（《晋书·文苑列传·左思》）。他们下这些赞词的着眼点也都是“博物”。可以说，在博物之项上，左思所下“功夫”（不等于“学识”）已经超越绝大部分前贤赋家。但是他的“博物”努力，显然已经入于误区，《三都赋》不但缺乏张衡那种科学体系性的光彩，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在描述“山川”、“草木”、“鸟兽”、“珍异”等物象时如何“本其实”、“稽之地图”、“验之方志”，甚至“摄其体统，归诸诂训焉”，结果尽管作品写得十分“典要”，似乎还具有了另一种学术严谨性优点，也掩盖不住“情”、“志”的缺失问题。过分强调知识化的结果，就是使得作品与文学的本性渐行渐远，这就是“博物”过度之弊。

必须认识到，如汉代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，这样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两大知识系统大整合大发展的时期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。文学躬逢其时，才有了知识化的蓬勃生长和全盛状态。一旦这种社会文化环境减弱或者丧失，文学知识化的进程便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中止。以“骋辞”、“体物”为重要特征的辞赋，在汉代臻于高潮之后，后继乏力，甚至不得不转型（魏晋之后辞赋主流逐渐转型为“抒情小赋”，或者努力从“俳赋”、“律赋”、“文赋”等方向寻找出路），这一事实就是明证，它告诉我们文学知识化是在特殊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。

〔作者简介〕徐公持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出版过专著《魏晋文学史》等。

（责任编辑 孙少华）

启 事

根据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实施意见》，为了办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期刊群，建设高端学术传播平台，自2013年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68种学术期刊的征订发行工作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统一代理，欢迎订阅。《文学遗产》2014年邮发代号改为80-438，您可以通过全国邮局订阅，也可填好“征订单回执”直接向我中心汇款订阅。

邮局汇款

收款人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刊运营中心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A座1403室期刊运营中心

邮 编：100029

银行汇款

户 名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开户行：工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

账 号：0200010019200365434

网上订购

http://www.ssap.com.cn

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刘振华 张明娟

电 话：010-59366555 010-59366565

邮 箱：qikanzhengding@ssap.cn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期刊运营中心

2014年1月